



曹远征：老龄化引发的三个热点问题



【财新网】（作者 曹远征）联系人口增长趋势及结构变化来讨论经济问题及政策应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经济学说史，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此前的传统农耕经济是“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人口增长长期停滞。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物质产品逐渐丰裕，使人口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不仅正增长，而且增速加快。工业经济以人口，进而劳动力增长为先决条件，开启了亚当·斯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也肇始了凯恩斯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宏观经济学，同时推动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观察，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意味着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机器取代劳动”。在劳动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这不仅会恶化就业，而且会积累贫困。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积累规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

由此，人口，进而劳动力增长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背景，成为其暗含前提。那么这个背景和前提的改变，将使整个经济学讨论的基础及政策应对发生重大变化。而当下，中国乃至世界都开始面临这一挑战。

人口老龄化，首先是劳动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期看，人口还会负增长。这些已开始改变经济发展的条件，进而改变经济发展的状态与趋势，当然也需要新的应对。例如，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不同于传统生产过剩式经济危机的新型危机。它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与人口老龄化所预示的代际更替问题高度相关。说穿了，就是因为少子化，金融市

场担心父债子偿还不起了。显然，应对这种新型危机的办法也就不同于以往，由此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逻辑。传统货币政策是基于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调控利率。但在快速去杠杆的情况下，会因市场的流动性极其短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央行必须履行最后的贷款人职责，不得不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进而使利率直降为零。此时货币政策就只能用扩表，缩表控制，成为区别于调控利率的第二种政策，目前又演变为发货币买国债的财政货币一体化的第三种货币政策。

过去我们讨论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日本失去三十年时，基本是在学理层面，并无亲身体会。但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口老龄化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而且比发达国家还严峻。结合人口的变化趋势来梳理中国经济发展思路，不仅重要，而且急迫。

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基本特征是少子化，老龄化，长寿化，因此，我想结合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来讨论当下人们关注的三个热点问题。即：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建设及潜在增长率下行。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变化。

自 2012 年开始，中国的劳动人口就开始大幅下降，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每年下降 200 万-300 万，加上退出市场的劳动力，中国劳动人口 10 年累积下降近 4000 万。同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开始下降，由 2008 年

的 0.491 的历史高点下降到 2019 年的 0.465, 十年下降近 0.03 个百分点。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

新进入市场劳动力下降首先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充沛程度的减弱。

目前, 15-45 岁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 致使城市化率已呈现出放缓的态势, 由过去 1.5% 下降到目前 1% 以下, 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过去的存量增量共同转移, 变成了纯增量转移。在用工需求稳定增长的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使最低工资水平持续提高。过去十年, 全国所有省市最低工资水平每年平均有 10% 左右大幅提升。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提高幅度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均 10% 上涨, 意味着其收入在 6-7 年内翻番。农民的务工收入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般看来, 农民家庭来自城市的收入, 约占其可支配收入的 70% 以上, 其中务工收入又占了 50% 以上。最低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使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成为过去十年中收入改善最快的群体。由此, 农民年均收入增速高于 GDP 的年增速, 不仅构成了告别绝对贫困的重要基础, 而且成为改善基尼系数的主要途径。

新进入市场劳动力下降, 其次表现为城市就业压力的缓解。

过去十年调查失业率始终未超过 5%, 同时, 市场求人倍数始终大于 1, 这都表明就业岗位供略大于需, 进而促使平均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于是, 我们看到了一组经济现象: 在过去十年中, 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两个提高, 两个同步”, 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所占比重, 并与劳动生产率提

高相同步；在国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并与 GDP 增长相同步，始终维持。与此前居民收入增长低于 GDP 增长的情况相比，这一态势明显改善改善了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关系。

过去十年，因 GDP 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不仅居民收入实现倍增，而且预示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到了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的顶点，开始过拐点，进入后半段。从过去十年总合生育率的变化来看，中国劳动人口仍在下降之中，这表明未来工资水平还会持续提高，初次分配改善将更加明显，从而为共同富裕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这意味着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就业持续扩大，在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就有更好收入增长机会的同时，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的剪刀差也会改善，从而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不必过度依赖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我们注意到，这方面改善，既有劳动人口下降而就业压力不大的条件，同时也有城市化的潜力。从全球情况看，当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时，城市化率约为 65%，而中国目前只有 60% 出头，即距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平均 75%-80% 的水平相差较大，而且也未达到人均 GDP 一万美元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如果持续深化改革，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使更多人受惠于城市化，就能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在少子化促使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后半段变得更加陡峭的情况下，做大蛋糕更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第二，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建设问题。

以 2012 年为分水岭，中国人口抚养比开始再次上升，与此相适应，

中国经济宏观杠杆率也由先前的下降转为上升。更为深刻的是，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抚养比较高的年代相比，那时抚养人口主要是少年儿童，而现在主要是老年人。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退，而且造成家庭资产负债表维持的困难。并由于这种困难，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养老的责任，也就是福利国家问题。

回想起来，十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使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促使我们开始研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能力问题。在这期间我曾与蔡昉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发现就是“未富先老”，特别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安排。坦率地说，在现行体制下，养老金缺口很大。例如，东北三省养老金早已经入不敷出。但是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观察，中国还有能力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因为还有一个资产，就是国有资产可以填补这个缺口。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自 2003 年起，凡国有企业上市，就要将流通股 IPO 市值的 10% 折合成股份划归社保，2018 年，又要求将国有股权的 10% 划归社保。

2012 年，在我们编制当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时，曾对社保这一缺口及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138

